

贞刚自有质

——记水利工程学专家黄万里

◆ 周文 查仁柏



黄万里(1911年8月20日~2001年8月27日),生于上海浦东新区(当时属江苏省川沙县)。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著名的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解放前他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等职;解放后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唐山交通大学教授等职。

他撰写的学术专著有《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等,论文有《暴雨洪水统计分析》、《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和《论治理黄河的方略》等。1957年,他独自一人反对修建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三门峡大坝,但未果。后再三提出修改方案,也一概

遭拒绝。该坝建成后的第2年,不幸被黄万里先生言中,上游干支流大淤而无法按原计划运行。同年,他因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和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上发表小说《花丛小语》而获罪,成为清华大学的三大右派之一,戴帽22载半。1990年他发表论文《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并将三峡大坝不可建的意见多次上书中央领导人,但均未被采纳。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术界独树一帜。

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1878~1965),是前清举人、早期同盟会会员、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共有12个孩子,黄万里排行第三。黄万里小时候调皮捣蛋,爬树钻洞,大呼小叫,奔走追逐,样样都来。

1 心系民生,立志水利

1924年黄万里小学毕业,进入无锡实业学校。毕业时,他门门功课均列榜首。1927年,黄万里考入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老资格大学之一的唐山交通大学。1932年12月,不满22周岁的黄万里以优异成绩毕业,还用英文发表了颇有建树的3篇论文,由桥梁界知名学者茅以升审定并作序,由学校出版。毕业后,黄万里在杭江铁路任助理工程师。

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湖北省云梦县城一夜之间成泽国,死亡7万余人。灾民之凄惨,举国震撼。1933年黄河又决口十余处,生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为此很多年轻人奋志学水利。黄万里也极为震惊,便和两位唐山交大校友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之职,欲出国改学水利。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于是他立志学水利治黄河。此想法得到父亲的赞许。经父亲介绍,他拜见了父亲的学生一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许先生对他说:“这次大水之后调查全



国水利工程师所长的专业，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个懂得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能是设计施工罢了。”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1933年，黄万里参加庚款赴美留学考试并被录取。1934年1月，他启程赴美。1934年2月至1935年2月，他在康乃尔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并获硕士学位，硕士论文是《暴雨统计》。期间，他听导师西雷教授讲授了多门水利工程课，又在理学院读莫多夫教授的气象学、气候学以及里斯教授的工程地质学等课程。毕业后，导师西雷教授建议他去爱荷华州立大学水利系深造，因为该校的伍德华教授是一位优秀的著名水利学家。后因伍德华教授已离校而受业于另一位教授迈尔1个学期。鉴于黄万里诚心求学的精神感人，伍德华教授后来还特地照顾他到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区正在施工的诺利斯大坝实习了4个月。1935年8月至1937年2月，他在伊利诺伊大学深造，获工程学博士学位，是该校第7位博士，也是该校工程院第1个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期间，他主修水利工程学，第一副科是地理学，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学和地质学等。他还师从经济地理学家布兰查德教授修习欧洲地理、交通地理。第二副科是数学。他在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中提出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一时轰动全校，引起业界关注。19年后才有人提出类似的方法。这使他在美国水利学术界享有盛誉，所以后来才有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写信向他询问对修建三峡大坝的意见一幕。

黄万里在美国3年多时间里，连读了3所大学，攻读了两个学位，还亲自驱车72000km，走遍美国众多水利工程和大河，还在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区施工大坝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发生特大

洪水，他又特地去了解情况。该河管理机关还招待他坐船参观，直达出海口。这些经历，使悟性极高又脚踏实地的黄万里眼界大开。他明白了以前所学土木工程理论远不足以解决洪水问题。他进而领悟到：水利工程将改变河流中的水沙流状态，从而使河床发生演变，因而治水就不能孤立地以水论水，以沙论沙，以工程论工程。这一感悟，影响了他一生的治河理念。

2 实地考察，踏上治水之路

1937年春，26岁的黄万里学成归来。他婉拒了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和北洋大学的聘任，立志当一名水利工程师，并于1937年底携新婚妻子到成都四川省水利局当工程师。

他到水利局报到一周后，便让他带几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时乘飞机到昆明，再步行返回。他们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与金沙江的交汇处，再沿金沙江顺流而下，经昆明、昆明等云南10县和四川雷波、屏山、宜宾等县，历时3个月，一路步行回到重庆，边走边勘测河道水情。

从金沙江考察回来不久，黄先生被任命为滩道委员会测量队长，成天在山谷、河道进行实地考察。什么都要实地看过的黄先生，沿着岷江从河口一直到源头，包括岷江的几条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几乎都走到了。不仅如此，长江上游部分河道和四川境内有代表性的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考察。所以后来他说：“曾步行6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

当时在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的河道上进行测量，其危险性可想而知。河面看似平静，却暗藏杀机。在川江上工作时曾有3人丧命。这些悲剧的发生，都因人们对川江河道的卵石缺乏认识所致。黄先生这样记述：“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5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眼见水流虽急却很浅，怎可能淹死人呢？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多层在移动着。乃知两人因无法站稳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头被石头撞破而淹毙。”总结这些事故，黄先生对于河床演变有了意外的认识。

这些实地考察虽然充满着危险和艰辛，但为他以后形成水文地貌学的观点奠定了基础，对其晚年形成在长江干流不能建大坝的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 治理黄河甘肃展才华 东北失意交大授桃李

1946年春，黄先生回到南京。不介入党派的他觉得抗战已胜利，该是为国家水利事业大展宏图的时候了。于是他决定到水利部工作。水利部任命他为视察工程师，参与全国的水利规划，并派他去江西视察航道整顿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还想留他在江西担任水利局总工程师，主持水利规划。1947年水利部改变主意，派他去甘肃担任新组建的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同时兼任水利部河西勘测设计总队队长，以配合黄河上游的规划，勘测水文资料。治黄本是黄先生多年的夙愿，他二话没说便举家去了甘肃。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降雨量少，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就是灌溉。黄先生在甘肃做的主要工作，一是整修旧的水利设施，建造新的水库水渠；二是勘探河西的地下水情况，以坎儿井的方式与培黎工艺学

校合作，尝试开发地下水。他在全省范围内建立水文站，制定了水利和水文工作章程，组织5个勘测队对全省水利资源作全面的考察和总体规划；组织修筑永丰渠、兰丰渠、靖乐渠，勘测地下水资源，调研坎儿井，主持起草《河西水利治理刍议》；规划兰州自来水工程。为了开展工作，他把在四川水利施工队的老同事动员到兰州，并和四川一样，就地培训人才，每天坚持给职员上专业课半小时。

黄先生在甘肃工作期间，1/3的时间是跑县乡，没有专车，只能骑马或步行沿着弯弯曲曲的河岸进行考察。

从1947年3月8日上任到1949年5月7日离开，黄先生在甘肃水利局工作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他一生从事水利事业的一个高峰，也是华彩熠熠的人生阶段。在这里，他独当一面，从运筹帷幄到具体的施工操作，从点将用兵到培训职工，从工程规划到资金运作，展示了多方面的才能。他不仅是一位水利专家，还是经营和行政的一把高手。

解放初，东北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1949年7月，东北赴沪招聘团到上海招聘各类专业人才。黄先生于是决定举家迁至东北，并动员十几位在四川和甘肃工作的老同事，一同报名北上，希望在东北干一番事业。但是他对一些工作的看法往往与领导不能一致，建议也得不到采纳，于是黄先生毅然辞去顾问一职，1950年6月回唐山交大教书。

由于黄先生生性耿直，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刚到唐山交大，便在校园的小字报上发表文章，针对时弊，提出“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的观点。他的“竞争”观点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立即遭到围攻和批判。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辩驳。

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唐山交大改为唐山铁道学院（现称西南交大），与铁道无关的专业都被调整出去。所以，黄先生于1953年初被调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

4 坚守良知，反对三门峡工程

从1952年开始，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聘请专家综合组帮助规划治理黄河。1954年1月苏联派来7人专家组。2月，中国专家与苏联专家对黄河进行勘察。4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成立。10月，《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完成。由于苏联专家都出身于水工，缺乏治理整个河流的经验，所以该规划的整体思





路是蓄水拦沙，要在黄河干流上建造46座大坝，并首选在陕县的三门峡建大坝。1955年7月，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1955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关于黄河规划的第1次讨论会。会上，许多专家对黄河规划交口称赞，只有黄先生1人力排众议，反对建设三门峡大坝。他还当面对周恩来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量是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1956年5月，黄先生向黄河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并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8期。《意见》指出：4000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在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归纳出4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他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的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黄先生深知，人类的活动、植被的破坏、气候的变迁，使黄河水含沙量将越来越大，对下游河道的加速淤积有一定的影响；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受雨水和黄河及各支流对黄土层的切割是一个自然过程，即使没有人为破坏植被，黄河也是含沙量极大的河流，下游河道的淤积改道也必然会发生，只是改道的时间延长一些罢了。

针对“黄河清”的设计思路，黄先生指出：“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会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

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6000秒立方米的清水可能要比短期的10000秒立方的浑水还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他说：“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

《意见》最后还反复指出：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

1957年6月10~24日，水利部召集50名专家学者和工程师在京召开三门峡讨论会。会上出现了3派：高坝派（360m，绝大多数），低坝派（335m，少数人），反上派（只有黄先生1人）。黄先生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规划。

高坝派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会清水长流了。黄先生对此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驳。他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一个建立在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三门峡修建拦河高坝后，泥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在7天专题会上，黄先生辩论了7天。到最后，讨论会成了对黄先生的批判会。在无奈之下，他又提出三门峡大坝一定要具有能刷沙出库功能的建议，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三门峡工程于1957年4月动工，1960年9月下旬开始蓄水。当1961年10月下旬库水位达332.5m时，黄河流率为 $2000\text{m}^3/\text{s}$ ，渭河口形成“拦门沙”，使5000人受洪水包围，25万亩耕地被淹没。黄先生的预言不幸被言中。

1962年，被壅高的水横向冲击，使两岸坍塌，80万亩农田被毁，一个县被迫迁走。事实已说明，三门峡建坝已失败。

1962年3月，水电部在郑州召开会议。会议的决定是将三门峡水库的功能改为“滞洪排沙”，汛期尽量泄空水库，拦洪水位控制在335m，闸门敞泄排沙，暂不考虑发电和灌溉。3月20日国务院批准该决定。但由于水库导流底孔被堵，致使低水位泄流能力不足，潼关河底高程并未降低，库区淤积仍在继续。为此，牵挂着黄河，牵挂着那里人民的黄先生，于1962年8月作了长诗《念黄河》，直接批评当年“胜利冲来头易昏”的人们。1963年8月黄先生又闻水利部开会，但仍未改正建坝时的错误观点，于是又写下了长诗《哀黄河》。



1964年春节，早在1957年已被打成右派的黄先生，再也不能坐视三门峡水库造成的灾难，不顾个人安危，再次上书毛泽东主席，但未果。随后他又上书副主席董必武，力陈三门峡大坝淤积的严重性，建议改建，并附上词两首《念黄河》和《哀黄河》。后来黄先生被水利部召见，并按水利部的要求，在60天内完成了《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但黄先生的这番心血又被打入冷宫。

1964年，中央开始实施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方案。在黄河两岸凿挖2个隧洞，铺设4条管道，供泄水排沙；8台发电机组被炸掉4台，剩余的4台仅发20万kW，只是原设计的1/6。但这次改建并没有成功。1969年进行第2次改建，花了6000万元将黄先生早在动工之初就力主不要堵死的原坝底的6个排水孔全部炸开。

在1964年12月18日的三门峡改建会议上，周恩来表示：对三门峡的改造中，“设想可以大胆些。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因为水库淤满泥沙后遇上大水就要淹没关中平原，使工业区受到伤害。”但周总理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向和精神当时并未得到切实贯彻。

1972年春，黄先生突然接到一项秘密任务，清华大学水利系领导给黄先生40天时间，让他就三门峡改建以及黄河、海河的治理（包括小浪底

工程）提供意见。从后来在黄先生的遗稿中发现的1972年5月22日给周总理的信函草稿来推测，此任务很可能是周总理下达的。他在信中指出，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排出坝外，才能挽救秦川于陆沉。1973年初，身无自由的黄先生被准许在监视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与河势。此次黄渭之行，他目睹了黄河中游人民遭受的“从下游移来的苦难”。于是他在诗《一面俯首听批，一面竭思治黄》中写道：“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是年夏，他听罢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宁冬梅报告三门峡大坝造成的灾情后，泪流满面，又写出了“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的诗句。

据资料显示，三门峡工程从1964年开始改建，到1973年12月完工时，一些水利专家对其的评价是：原指望能带来黄河清水长流的三门峡工程，却成为水库不像水库，电站不像电站，成了个四不像。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黄先生回京探亲。他的身体已不太好，牙齿掉落，前列腺出了毛病。1977年3月又出现血尿。随着大形势对知识分子的转暖，他向校领导提出留京治病的要求。从此他完全离开了劳动改造地三门峡。

1977年6月12日，他上书陈云副委员长并附《论治理黄河的方略》。9月29日，他上书邓小平副主席。他在这两封信中都很有信心地说：“黄河是可以三五年内（基本）治好的”。1978年1月9日，已多年不准从事科研工作、右派帽子尚未摘掉的黄先生却又向校方提出了治黄的科研计划。

1973~1976年，政治上有了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黄先生在1991年自费出版的诗集《治水吟草》中写道：在此期间，我在头戴右冠、边挨批斗、边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努力跟踪世界前沿的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研究了新的动力学规律，写出了论文《论连续介质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还写出了大量的诗篇。他认为这是他“平生最大的成就”。

黄先生在身受严重的政治迫害下仍能专心于研究治理黄河，许多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冒死犯颜也要提出来，其勇气和动力何来？缘由主要有二：一是坚持真理，坚信自己，坚持公民的权利；二是他研究治水是带着深厚的感情去研究的，在心里装着人民，装着国家，装着民族。他牢记父亲的一句话：中国历代统治者，只有他们对不起农民，

没有农民对不起他们。

然而，黄先生反对建设三门峡大坝的意见已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情况下，他的改建意见和建议为何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拒之门外，甚至还给他立一条不许研究治理黄河和不能接受治黄咨询的规定呢？有人如是说：这是有人不爱人才，爱奴才。可是，历史的教训是：奴才好唤易误国，人才难得能创业！

5 右冠钦定一顶，书生图圈半生

1957年5月，帮助共产党整风期间，黄先生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花从小语》。小说开头是他填的被毛泽东认为毒草的一首词《贺新郎·百花齐放颂》（见附件1）。

小说批评了北京的市政建设，批评了三门峡方案讨论中那些明知水流必带泥沙，工程必将失误，却不据实直陈，甚至跟着高唱虚幻的“黄河清”的专家学者，还批评了当时盲目照搬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这便成为黄先生被打成右派的重要“罪证”。一次，毛泽东遇见黄先生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从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1957年6月《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黑体字标题下转载了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大毒草《花从小语》（后来“什么话”便成为《人民日报》发表右派言论的专栏标题）。紧接着是《人民日报》发表了一连串批判黄先生的文章；在清华大会小会批黄；一些杂志（如《北京文艺》等）也专门载文批判。9月《中国水利》杂志也出了批黄专号，批判黄先生的治黄主张和反对三门峡工程是“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还质问黄先生“骨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一时间，批黄的浪潮铺天盖地，来势凶猛。

1958年黄先生被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等权利完全被剥夺，被下放到密云水库工地劳动，接受批判，还要交上一份份“检讨书”。但由于顽强的自信，不乏良知力量的支持，黄先生从不屈服和后退，进行辩论。即使当清华大学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仍掷地有声地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为了给黄先生定罪，当时的清华大学水利系党总支

还设了一个圈套，让时任工会副主席的黄先生出面组织工会开会向党提意见，随后定他是向党进攻的组织者。在这次反右运动中，黄氏一门出了5个右派：黄先生及其两个弟弟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妹妹黄路、黄素回。有的简直是莫名其妙地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所以有人打趣说，“一门五右派”倒也可以同“三代四博士”相映成辉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蝉，也不只是一种声音。清华大学水利系就有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热血学子自发地组成一个坚守良知的小群体，如共产党员秘书胡家博，共青团员助教李亚莉，人事干部章会兴、廖松，学生党治国、李恒章、欧阳树棠等，自发地为黄先生辩护。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另外还有一些不知姓名的学生，因为支持黄先生的观点或新闻电影制片厂在清华大学拍摄《右派向党进攻》纪录片时无意间站在了黄先生旁边或被摄影镜头扫进去的学生也未能幸免，都成了右派。

黄先生在密云水库劳动改造期间，已是48岁的他却与农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因而累得要命，还饿得要死，下班天已黑乎乎，一瘸一拐地朝工棚挪去。他在家书中写道：“我真需要哪个儿子在身边，可以扶着我回去。”他每次回家坐到天擦黑了也不愿意走，几乎每次都要挨到最后一刻，才被家人搀扶着往火车站走去。

1964年，三门峡工程败相已露，印证了黄先生的预言。在此种情况下，黄先生本有一次摘掉右派帽子的机会。一次，毛泽东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乍看上去这是一个黄先生“摘帽”的好兆头，殊不知还得附加一个条件——要黄先生写个检讨。凭黄先生的秉性，自己没有错误为何要写检讨？于是他赋诗填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学问，而在1957年三门峡70人（有一说是50人——本文作者）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说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黄先生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与“伟大领袖”较劲，能有好果子吃吗？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场运动的对象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地富反坏右”也一概莫能清闲。对于黄先生来说，文革10年的日子比打成右派后的9年更难过。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关牛棚，挨批斗，受折磨，还得挨揍等。



黄永熙先生1966年8月被红卫兵抄家时的照片

1966年8月上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抄了黄先生的家。红卫兵让他拿出存折来，而他的存折上却只有20多元钱，红卫兵看了一眼就将存折扔了回去。8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再次闯入黄宅，用带金属扣的皮带抽打黄先生。致使黄的后背条条血痕，殷红的鲜血渗出衣裳，不能躺，只能俯卧。

1969年，黄先生随部分教工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该农场其实是一个吸血虫病疫区的劳改农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他又被扣上特务帽子。为此又斗得他精神恍惚，甚至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不是特务，要女儿帮他回忆了。由于他白天头顶烈日在田间劳作，夜里又连续遭批斗而不得安眠，因而曾多次因中暑晕倒在田边。6月的一天，由于他体力不支，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摔倒了，头脑昏昏沉沉，浑身燥热难忍，所以顾不上吸血虫，便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去清凉。后来从田埂上往回爬时，又因不辨方向，他爬到了清华另一个连的驻地，无奈之下只能爬进谷仓，躺在水泥地上纳凉。中暑后的他已不能干活，但仍要到大田去经受烈日暴晒。在此种情况下，黄先生深感病情越来越重，生命危在旦夕，自己奔波万里、治理江河的著述和理想行将付诸东流。于是在苦闷之下，他写下了七绝《梦吟绝笔》，以抒胸意：一死明知素志

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1971年秋，鲤鱼洲农场因吸血虫病肆虐，致人丧命，整个农场停办，学校教师于1972年初撤回北京。他住进有陈年积水的小屋，一边治疗水浸泡所致的溃疡，一边挖防空洞。但工宣队还认为，让黄先生呆在北京太便宜他了，于是在1973年又把他发放到清华水利系的另一基地三门峡水库。领导给他立的规定是：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扫厕所，一个月交一份思想汇报。另外还立了一条特殊规定：“禁止治黄研究及接受校外技术咨询”。黄先生在此度过了6年！

1974年初“批林批孔”开始，黄先生又被揪回清华接受批判。

1977年底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并着手解决右派问题。1978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55号文《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在大好形势下的1979年春，全国许多右派获得解放。可是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和黄万里的问题却杳无音信，原因是前者有想另搞一套治校方略的野心，后者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认定的右派。直到1980年12月16日，黄先生总算等来了没有一句安慰话、没有一声道歉声，甚至连文号都没有的冷冰冰的157字平反决定！总算结束了他长达22年半之久的右派生涯！

黄先生的平反，意味着全国反右运动的善后工作将告结束。在这场运动中，中央公布的数字是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显示：全国右派总共为3178470人，是公布数字的5.6倍！其中清华大学的右派有571人之多。

然而，反右的负面影响并不会随着善后工作的结束而消除，其阴影至今还存留在人们的心灵中。真话不说说假话，迎合圣意上青天，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痼疾，也是一切腐败的根源。这难道是反右运动设计师的初衷吗？

黄先生被打成右派后，精神上并未垮掉。精神上折磨他最深的则是自己因言获罪而连累了家庭。1957年，黄先生长子高中毕业，当时反右刚开始，高校招生还未实行株连子女的政策，因此考上了北京大学。后来其次女、次子和小女都受到了牵连，考了高分也上不了大学，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黄先生曾为此而落泪，甚至因小女儿上不了大学而在几天之内就急白了头。另一个令他痛苦不迭的是不

让他发表学术观点和著作，自己所学不能报效祖国的水利事业。

6 三峡工程受人瞩目，黄万里却反对上马

黄先生晚年最关心的是长江三峡工程。他的观点又是与众不同——反对三峡工程上马。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看，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10亩地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的河槽，阻断航道，由此会毁坏四川坝田；目前缺乏测量床沙输移率的可靠手段，测量只能定性，不能定量；长江河床的造床质是砾卵石，不是泥沙，修建大坝后砾卵石难以排出，将堵塞河道，天长日久，后果不堪设想；在国防上，大坝安全也十分重要。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由于其意见与水利当局决策者的意见相左，所以相关研究的课题、资金、人员、资料等他都不能与闻，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

即便这样，他也并不气馁。从1985年起，他一次又一次地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希望将三峡不能建坝的意见反映到最高层。1985年3月，他致书国务院总理，建议以云贵川湘鄂赣豫各省的大中型水力发电厂代替三峡电厂。1985年10月8日，他上书邓小平。1992年三峡案在人大通过后，他于11月14日又上书新的中央领导人江泽民和政治局委员。此外，黄先生还在杂志上发表关于三峡和其他水利方面的论文。三峡工程开工后他还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一个公民和科学工作者的关切及忧虑。

黄先生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其正谬还有待时间的检验。所幸的是他的这些言论、观点、意见，没有如20世纪50年代那样受到批判和政治打压。

在与癌症抗争17年之后，黄万里先生再一次躺到了病床上。2001年8月8日，他的学生赖敏儿、沈英去看望他时，他自知沉痾难愈，与他们再次谈起了治理长江之事。后来沈英夫妇见到黄先生有些激动时便起身告辞。走后，黄先生觉得话未说完，于是向夫人索来纸笔留下了遗嘱：“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8-8手笔候存”

7 崎岖坎坷求真谛，人民儿子赤子心

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先生90岁诞辰，清华大学水利系为病重中的黄先生举行了庆祝活动。活动中赢得全场掌声时间最长的要数黄先生子在发言中的一段话。他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政治条件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政治条件不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有利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讲真话。”

讲真话真的不易。黄先生就是因为讲真话而获罪，因为坚持讲真话而被剥夺了一切，右派帽子戴了22年半。但是，讲真话又是如此之重要：只有当只讲真话，不讲假话，只爱人才，不爱奴才的环境到来之日，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黄先生的父亲黄炎培曾给他的座右铭是：“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如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可是他却放弃了“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因而因坚持真理、坚持讲真话而断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教书、科研、发表著作和观点的权利统统被剥夺，甚至正当做人的权利也被剥夺。

黄万里先生的一生中，前半生是辉煌的，后半生却是苦涩的。但苦涩的后半生却彰显了他为真理、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奋不顾身、无所畏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人格和品德。黄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民的水利工程学专家。

也许黄万里的许多治河理论尚待后人评说或实践检验，但作为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水利事业的科技工作者，他的赤子之心足以彪炳史册。而他的悲剧经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睿智远见，以及他对真理的信仰和执着都将启示后人。

黄先生驾鹤西去已多年，但他在1964年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至今似仍有价值，仍值得让人回味和思考。他说：在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但愿黄万里先生关于三峡大坝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而这也正是他自己所希望的。

本文主要根据赵诚著《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写就。感谢黄万里先生家属为本文提供照片。